

导言：20 世纪 80 年代的教训

显然，20 世纪 80 年代以一种兴奋而非哀怨结束。1989 年见证了斯大林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为统治形式和意识形态体系以及政治标杆在苏联戏剧性的坍塌。绝大多数人认为，这种坍塌的突然性（甚至是坍塌事实本身）令人惊讶。对许多人而言，这种惊讶是愉快的，标志着自由战胜了专制。对其他人来说，它令人沮丧，标志着理想的幻灭和革命乐观主义的衰退。

接踵而来的对这些事件的分析都过于局限于孤立的事件或以事件为导向（借用布罗代尔对三种历史时段的区分，即事件性），缺乏充分的结构或周期（综合）的分析。如果人们主要从事件自身的直接语境进行分析，甚至重大事件——1989 年肯定是重大事件——也难以清晰地理解。如果我们试图这么做，我们不仅可能误解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可能从中得到错误的教训。这是我担心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从 1989 年的事件中匆忙抽取相当扭曲的含义的时期（但愿这个时期不长）。

（前）共产主义世界正在得出错误的结论，在那里，市场的魔力正在取代计划的魔力，然而对这些国家来说，市场基本上

不是比计划更有效的经济福利途径，因为这些国家主要的经济困难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产生于它们内部的经济机制，而是来自它们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中的定位。

西方世界也正在得出错误的结论，在西方，列宁主义的失败被解释为威尔逊的自由主义的胜利，然而事实上，1989年不仅代表着列宁主义的消失，而且也代表着20世纪两大意识形态对立双方的消失，即威尔逊主义的末日对列宁主义的末日。我们在东欧所见证的远不是1776年或1789年那种精神的发现，而是1968年的余震。

第三世界同样正在得出错误的结论，在那里，许多人认为列宁主义的失败明显削弱了这些国家反对北方经济控制的斗争，然而事实上，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斗争中，过去45年苏联的修辞只起了有限的作用，它们当前的软弱地位首先是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断发生作用，其次是因为它们的“民族发展”策略不够有效，第三位的原因才是目前苏联无力（和不愿意）支持它们。指责“修正主义”的戈尔巴乔夫就像把莱赫·瓦文萨看作托马斯·潘恩一样，只重事件而不切实际。

本书是20世纪80年代写的论文选集。最近的一篇写于1989年9月。因此所有的文章都写于东欧最富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之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解体）。鉴于第一部分的文章是关于地缘政治的，也许把它们重印在这里的计划显得有些大胆或可疑。然而恰恰是因为所谓“共产主义的终结”，我才把这些文章收集在一起——旨在论证这不是一个突然的、出乎意料的戏剧性事件，而是一个更大过程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其主要因素是——绝非自相矛盾

地——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时代结束了。虽然许多评论家欢呼 1989 年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开始，但本书的论点正好与之相反，认为它标志着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终结。冷战才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冷战结束了，因此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现在已经终结。

为了使我们弄清 1989 年的事件，有三种向量需要加以分析。第一种是现代世界体系中霸权的周期模式。第二种是 1789 年和 1968 年之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意识形态日趋明显。第三种是发展中深刻的不确定性，或者从一种历史体系到另一种的转变实际上是如何出现的。对每一种力量的说明都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因此在这个导言里我只能作一个概述，希望促使读者把从后面文章里（以及我其他著作里）找到的细节汇集在一起。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基本结构之一是世界体系内部霸权的周期性的兴衰。我以前曾经分析过我何以相信这种结构发生作用。^① 第三个霸权的历史，也就是美国霸权的历史，最好从 1873 年开始，也就是所谓 19 世纪的“大萧条”开始，在那之后，人们可以说英国的霸权时代已经结束。当然，大不列颠仍然相当强大，实际上在世界体系中仍然是最强大和最富裕的国家。但它不再是霸权性质的。它的经济优势已经消失。当时，它面对着德国和美国日益成功的竞争，而这两个国家也变成了竞争霸权的对手。大不列颠还发现，甚至法国的经济竞争也成了一个

① 见我的“The Three Instances of Hegemony in the History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chapter 4 of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37–46。

新的问题。

地缘政治的后果是相当深刻和相当巨大的。欧洲（或扩展的欧洲，在这个词的意义上包括俄国和美国）从一种以英国政治意志为主的境况转到一种恢复了权力均衡的境况，这是一种激烈的强国竞争的境况，一种不确定的重新组合联盟的境况。大约有半个世纪，这种竞争主要在“欧洲之外”的世界、在世界经济的边缘和半边缘地区展现出来：在非洲、东南亚和太平洋区域“争夺”殖民地；肢解奥斯曼帝国和中国；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进行军事干涉。在萨拉热窝是个偶然事件，那是个边缘地区，入侵到欧洲大陆本土，作为这次国际之间敌对的顶点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但是，真正象征的年份不是 1914 年，而是 1917 年。诚然，1917 年标志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布尔什维克通过暴动赢得了政权。但是，1917 年还标志着美国进入战争，其承认根本问题绝不是遥远的巴尔干民族的命运，而是为在下一个时代控制世界体系而发生的德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

当然，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了。但是，正如法国拒绝承认它的世界体系 1763 年被英国打败，坚持进行新一轮的战争（发生在 1792 年到 1815 年），^① 同样德国也拒绝承认它的世界体系在 1918 年失败，坚持另一轮战争（发生在 1939 年到 1945 年）。

如果我们把 20 世纪美国和德国最后一轮漫长的斗争与 18 世

^① 关于 1792 年至 1815 年法英斗争的分析，以及法国革命在其中的作用，见我的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I: The Second Era of Great Expansion of the Capitalist World-System, 1730 - 1840*。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80, ch. II, 55 - 126。

纪英国和法国最后一轮漫长的斗争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在地缘政治上明显的相似，而在地缘文化上又明显不同。在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上，所有三次霸权争斗都发生在海洋国家和陆地国家之间。所有三次都是海洋国家赢得了胜利，但每次都需要某个大陆国家的地面部队给予关键的帮助。英国在最后一轮斗争中为了打败法国需要俄国的援助，美国在最后一轮为了打败德国同样也需要俄国的援助。

但这里出现了地缘文化的差异。法国在 1789 年发生了一次革命，在最后一轮斗争中，这一事实在地缘政治上大大有助于法国，当法国军队越过欧洲的边界时（按照常规、标示和帝国的边界），至少最初他们被当作普遍化理想的胜利的先驱。他们体现了反对旧政体的“革命”。

德国在它最后一轮斗争之前，没有一次类似的普遍化的革命。它几乎就要发生。世界“期待”它发生。俄国布尔什维克指望它发生。但那种革命并没有发生。也许斯巴达克同盟操之过急。也许他们应该等到 1933 年。但是，到 1933 年，斯巴达克同盟已经出局，德国可能发生的唯一的革命是一种反对普世主义精神的革命。当德国军队越过边界时（奥地利除外），甚至从一开始就没有人欢呼他们是革命的英雄，而是把他们当作黑暗的代表。这种地缘文化的差异——事实上是俄国而不是德国在 1917 年以后体现了一种普遍化的理想——导致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带有矛盾心理的地缘政治情境。

另一方面，1917 年是个转折点。这时候，20 世纪两个伟大的思想家——伍德罗·威尔逊和列宁——进入了世界的舞台。威尔逊宣扬美国主义，或力图“保障民主政体在世界上的安

全”。列宁宣扬共产主义，或力图使各个地方的工人阶级作为全球性的阶级掌握政权。那时，一直到1989年，这两种方案呈现为可选择的、对立的意识形态。然而，他们有更多的共同之处，而不像两个阵营通常承认的那样。他们共享启蒙运动的遗产，都相信人类可以理性地、有意识地建设美好的社会。他们都相信国家对这种建设具有关键的作用，是理性的、有意识的、集体做出决定的所在。他们都对未来有一种世俗的看法。而且，对于世界上的边缘民族，他们都有“民族自决”的理想，所有的民族都应该“平等”。最后，他们都关心世界人类的最终命运。他们都有这样的观点：历史必然沿着他们那种普遍化的理想的方向前进，而且越来越快，最终，他们说，不会排除任何人。

当然，我们不需要夸大。在“美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别，两方面的文本都详细解释了它们。另外，如同理论一样，在实践中也存在着许多差异。但它们是否是对抗的敌人呢？有摩擦，也有窘境，因为事实上是俄国而不是德国实行了列宁主义。而地缘政治的现实是，1917年（并且直到1945年），美国地缘政治的主要敌手仍然是德国，在1917年（并且直到1945年），美国需要俄国军队的支持来赢得它的“三十年的战争”。因此，美国的困境是：如何处理它与苏联的冷战（安德烈·方丹提醒我们，冷战始于1917年，而不是1945年）^①同时又与德国进行（或准备进行）一场真正的战争。于是也就

^① 见 Andre Fontaine, *Histoire de la guerre froide*, 2 vols. Paris: Fayard, 1969, 1971。

有了苏联的困境：如何坚持实行列宁主义同时又防御德国军事扩张这更直接的危险。由于军事的原因，苏联需要美国，美国同样需要苏联。此外，苏联认为美国是技术上的典范，尽管不是经济组织上的典范。（因此列宁的格言是：“共产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

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天才使他们找到了解决困境的方案，不论是好是坏，该方案允许那种以共生方式相联系的、假定的意识形态敌人进行协作。这个方案就是我们常说的雅尔塔协议——不是在那里达成的具体的正式协议，而是协议传递的精神，应该强调，对于这种精神，丘吉尔没有表示疑义。实际上，1946 年，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的演讲里虽然创造了“铁幕”一词，但他并不是谴责雅尔塔协议，而是谈它形式上的贡献。

1945 年以后，在美国霸权的宏伟建构中有两个军事支柱。一个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它保证美国有必要的军事力量实现它的政治和经济目标。第二个是与苏联的调解，它保证在不可能赢得胜利（即使不会失败）的竞争场所——在欧洲的核战争——永远不需要这种军事力量。

广大公众集中关注这种冷战对峙中的军事构成，都没有注意到暗中支撑着 1945—1989 年欧洲均衡的关键的政治—经济交易。美国为苏联提供而苏联也乐意接受的是，在东欧创建一个苏联防护区，在这个区域内，苏联可以确立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但不能超越那些疆界。

这一交易对双方的好处是巨大的；否则，它不可能一直保持下来。对苏联来说，有三种主要的利益。第一，它允许苏联

在经济上利用这个地区，从中获得巨额的“战争补偿”。第二，它为苏联提供了防御德国复活的军事盾牌（这种需求产生于对1945年以后地缘政治现实的误解，但在心理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第三，从长远看也许是最重要的，它使苏联能够在东欧、西欧和世界其他地方阻止（甚至镇压）革命的社会主义倾向。这后一种努力在欧洲（包括东西欧）比在其他地方更加成功。但它被认为对斯大林建构的那种苏联体系至关重要，因为苏联保持着对共产主义话语的垄断，任何第三世界的“冒险”革命都不会打破其与美国小心构建的均衡。

这清楚地表明了美国在这种安排中的利益。对东欧来说，苏联实际上是附属于美国的帝国主义力量，而且做得非常有效。1948年的清洗消除了当时仍然处处存在的独立的“极左”因素。这并没有消耗美国的优势。对于世界经济直接的经济扩张，当时并“不需要”苏联集团。美国尽其所能控制西欧和日本的经济“重建”。因此，它乐于暂时摆脱对苏联集团应负的责任，因为它知道，以后把这个地区拉回世界经济的商品链里不会成为问题。

对美国来说，最后的增益与苏联最后一种利益完全一样。每一种意识形态话语都支持着另一种，没有另一种就显得没有道理。在美国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名义下，冷战使每一方都在它们的阵营里保持着严密的秩序，以它们觉得合适的方式清理家族，调整后代人的思想。

由于美苏之间的安排，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相对地没有受到挑战。但是，毫无疑问，霸权也孕育着它们自己的消亡。这在后面的文章里作了充分的讨论。两个主要的因素是：西欧

和日本不断发展的经济力量，使它们成为美国的竞争者，并导致它们在政治上日益独立；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不愿意接受雅尔塔协议为它们安排的命运，导致了中国、越南、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地方的革命。

这些日益增加的困难如何导致 1968 年世界范围的革命，后面的文章也作了详细讨论：1968 年作为反对美国霸权的革命和作为对“旧左派”的否定的双重作用；世界范围的有组织的对它的镇压；它长期成功地暗中破坏“旧左派”的意识形态前提；以及它坚持颠覆世界秩序的地下活动。

本书对美国试图利用它建立的霸权机制减缓它经济衰退的方式——先是通过尼克松—福特—卡特时期的低姿态，然后通过里根时期的男人气质——也进行了讨论，说明为什么这些策略无法放慢衰退的步伐。

最后，当美国的力量被充分腐蚀时，苏联别无选择，只能进入戈尔巴乔夫“改革开放”的危险境遇，期望苏联作为一个大国的作用（或至少俄国的作用）能够在残存的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中幸存。

在这些文章里，最后我论述了 21 世纪上半叶在未来世界经济扩展中地缘政治重组的可能进程。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对美国霸权时期进程的整个讨论，只是论及现代世界体系周期性的节奏。1989 年的事件还应该置于体系的长期趋势以及它的曲线结构局限的语境之中。

法国革命作为一次世界历史事件，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主要影响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成熟，而这最符合无止境的资本积累。1789—1815 年的事件改变了主要的政治意识，把变化是常

态的概念以及对体系的政治机制不断发展的期望，强加给一般人的心理。正是对这种新的世界观的反应，19世纪出现了三种关于现代世界体系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时还出现了把这些意识形态转变成经验主义现实的制度化的方式，即历史社会科学。^①

在三种意识形态的相互斗争中，其政治实践的结果常常是两个结盟反对第三个，因此区分它们立场的界线极不确定。三种立场远不是固定的。它们是一些声调而不是教条，基本上偏向社会变化的速度和程度以及国家在其中的作用。没有任何两种社会分析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表达这些意识形态立场。如果有三种声调，就会有无数具体的哲学态度。^②

对三种意识形态表现及发展的分析表明，1848年以后直到1968年，自由主义明显是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它在非常简单的意义上居支配地位：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断把自己限定在自由的范畴内，如此就不再有纯粹自由主义的地位，而同时在任何时刻都不能抛开自由主义。人们可以认为，1848年以后，实际上只有两种意识形态：保守的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愈来愈被赞赏自由的人吸收，先是伯恩施坦的版本，然后是考茨基的版本，最后是列宁主义的版本。

自由主义有两种力量。它反映了体系的基本趋势——无止

① 关于19世纪这些发展的讨论，见我的“The French Revolution as a World-Historical Event”，*Social Research*，LVI，1，Spring 1989，33-52。

② 关于这种论点更详细的解释，见我的“Trios idéologies ou une seule? Le Problématique de la modernité”，in E. Balibar and I. Wallerstein，eds. *Les Trois idéologies* (forthcoming)。

境的扩展，不断调整形式但又永远复制实质，同时伴随着普遍参与美好社会的前景，无论它仍然多么不平等。这种力量广为人知，但第二种力量却经常不被承认。事实上它经常被否认。自由主义是唯一使国家结构长期巩固的意识形态，是强化正在发生作用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策略。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诉诸于超越国家的某种“社会”，这种社会在其他机制中找到它的表达。正是因为自由主义是个体主义的和契约性的，它发现冲突的最终解决在于国家的决定，只有国家被认为没有它自己的“利益”，而是多数达成和解和一致的中介。

国家作为仲裁者可能是它最有力量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自由主义是改良主义的，而改良主义强化国家。自由主义使国家合法化，而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从哲学上破坏它。但是，由于国家体制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运作至关重要，所以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可能以它们的纯粹形式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内部取得优势。它们不得不采取混合的形式：要么是保守的自由主义，要么是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

1917 年的伟大变化并不在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立，而在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南北问题第一次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心。正是这一问题说明了 20 世纪位置的转换，从 19 世纪晚期的二律背反变成了美国主义对列宁主义的形式。这就是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区，即威尔逊所谓的“自决”的对象，与那些应该保证其“民主体安全”的国家。于是，俄国革命发生在工业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但事实上它同时也是非核心国家中最“先进”的国家。如果说 1917 年列宁仍然使用某种欧洲式的强调工人利益的话语，那么到 1920 年在巴库召开东部人民代表大会时，显然列宁

主义已经变成了对南方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的表达——1920 年南方仍然被称作东方。^①

正是威尔逊的和列宁主义的两种普遍化的自由主义的密切合谋，说明了为什么美苏能够（在敌对的表面背后）轻易地建立共谋关系。它还说明了为什么 1968 年的造反者能够很容易地（而且正确地）把两种政体和两种意识形态置于同一个范畴。1968 年重新打开了 1848 年以后意识形态的一致感。^②

1968 年的革命对自由的真实性提出挑战，包括它们所有的表现形式。它首先挑战的是关于国家的信念，即相信国家是有意识的集体意志的理性仲裁者。1968 年的革命者不仅挑战那些在国家组织中的掌权者，而且也挑战那些在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中的掌权者。因此他们挑战所有古典的反体系运动，这完全因为它们（在许多情况下）已经掌权，并在利用国家的神话，把它作为有意识的集体意志的理性仲裁者（或化身）。把国家归纳为只是多种政治“行动者”之一，是“新的”反体系运动潜在的目标。结果“旧左派”的历史策略——追求国家权力——不再被看作是社会改革的关键策略；实际上，许多人认为，它的指向完全相反。

拒绝把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论威尔逊的形式还是列宁主义的形式）绝不是一个小的插曲。它表明与我所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地缘文化的思想前提的彻底断裂。有些人

① 关于这点最清晰的理论评价是 M. Sultan-Galiev 著作。见“The Social Revolution and the East”, *Review*, VI, 1, Summer 1982, 3-11。

② 见 G. Arrighi, T. K. Hopkins, and I. Wallerstein, “1968: Great Rehearsal”, in *Antisystemic Movements*, London: Verso, 1989, 97-115。

把地缘文化说成是这种世界的上层建筑，我更愿意认为它是它的下层，更隐而不见的部分，因此也是更难接触的部分，但如果没有这部分，其余的部分就不会发展。我通过与地缘政治类比把它称作地缘文化，并不是因为它是超越地区的或超越国家的，而是它体现了世界体系中运作的文化框架。

自 1968 年以来（特别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对地缘文化的挑战采取了三种主要的形式，事实上它们都是同一个主题的变体，即否认自由主义的普世主张。第一种形式是新的理智的聚焦于“文化”，与聚焦于“经济”或“政治”相对。这种情形基本上可以说产生于对通过改变经济和政治形式来改变世界的成效感到幻灭。

这种幻灭感——1968 年的心情——导致许多人认为文化是一个可替代的场所，在这个场所里，最终人类的行动会产生效果。在最近整个论“文化”的著作里，“代理”的概念不断作为主题出现。针对据说来自政治—经济领域的所谓的客观压力，文化追随者断言人类的代理会进行干预——作为内在的可能性，作为集体希望的源泉。人民受到压迫（即受到国家压迫），但人民（和/或知识分子）具有锻造他们命运的力量（并运用这种力量）。如果这么分析，那么我们何以仍然生活在持续不断的压迫性的体制之下，就成了神秘的事情。但人们不必玩世不恭。对“文化”的关注表明是在寻找现存体系的出路，而这种出路不是通过已经失败的“古典的”秘方。因此它支持政治活动。

挑战地缘文化的第二种方式在于创造了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概念。这些术语并不只是旧关系的新装。它们是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地缘文化基本特征的一种迟来的承认：种族主义

和性别主义是它结构内部固有的、必然的存在，尽管（甚或因为）它有普遍化的主张。这种挑战既采取知识的也采取组织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研究领域，也创造了新型的社会运动。这第二种形式的挑战既与一般对文化的关注交迭，又比那种关注更加具体（和集中）。

然而，其政治含义并不完全清楚，因为关于它们的争论在反性别歧视、反种族歧视的运动中仍然构成内部分裂的主线。对某些人来说，对“身份”的追求（和证实）用作反对普遍主义斗争的框架，但也用作世界范围斗争联盟的框架，希望最终创造一种新的地缘文化。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种相同的追求可以作为一种更新的分裂主义的民粹主义——最近在（前）共产主义世界的发展表明，这些地区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不同——而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普遍化的自由主义框架内，它很容易复原。

最后，对地缘文化的挑战要在“新科学”里发现，“新科学”本身就是对现代世界体系最古老的知识基础的直接打击，如培根—牛顿的科学。“科学的危机”与世界体系的危机和运动的危机的联系，在本书的不同文章里都有论述。这里我只是强调对“文化”的关注与对“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的关注的联系。自然科学家和数学家倾向于生活在远离“人文学科”的世界，甚至更远离反对种族主义、反对性别主义的运动。这些群体大部分互不交流，他们也不阅读彼此的著作。因此，当“新科学”在这些科学机构封闭的墙外被“发现”时，它可能被以非常浪漫的方式加以解释，因此失去了它作为分析工具的内在的力量。这种对科学分析的直线、均衡过程的中心性的反叛，

以及对完全精确的理论可能性的反叛，其深刻力量不在于否定基础科学事业——如对物质现实的光学理解——而在于科学的方法（重被释义为努力解释复杂性，而不是努力把复杂性减少到最低限度）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智性工作的友好关系。恰恰是对“两种文化”概念——科学和/或人文科学——的否定才是实质性的冲击。两种文化的概念服务于同样的目的（实际上是本质相同的东西），如像社会科学里一般和特殊的认识论之间的区分——都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地缘文化体系的柱石。“新科学”已经致命地消除了培根—牛顿的科学的前提，因此它在 1968 年以后对地缘文化的挑战中是基本的因素，不论“新科学家”自己多么少地意识到这点。

于是，我们来分析 1968 年所需要的最后一个因素，即体系的危机或发展的不确定性。对 1989 年最严重的误解之一，是把它看作以某种方式强化了体系。我们说过，1989 年政权的变化是潜在地继续 1968 年反叛的结果。虽然它的地区性的表达非常自然地反对该地区先前列宁主义的统治话语（和实践），但这决不会使它不是反对自由主义的一种反叛。一时间，在绝望之中，新政府在“市场”和其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处方中寻求救助，但这不再有什么意义，可能也不再有什么利益，还不如它以前对坦桑尼亚、巴西或多米尼加共和国那样。而那些国家的居民很快会非常清楚这一点。

这里所用的世界体系的发展模式，衍生于“新科学的”分析方式，这在本书的许多文章中都有提示。简单地说，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构成了一种历史体系，因而它具有历史生命；它有一个起源；它有表明其特点的规律性的周期节奏和长期趋

势；它有内在的矛盾，这些矛盾会导致它最终灭亡。^① 这种论点是，短期的矛盾导致中期解决，而中期解决转变成长期的直线弯曲，接近于渐近线。^② 随着它们接近这些渐近线，回归均衡的压力逐渐消失，导致前所未有的震荡和分裂。结果不是偶然的大波动造成小的变化，而是小的波动造成大的变化。

由于对短期矛盾的中期解决不再随时可以实现，因而出现了分裂的危机，这种危机对体系是灾难性的。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统治力量来说，列宁主义的失败实际上是个很坏的消息。它消除了世界体系内部最后重要的政治上稳定的力量。要把无法修复的东西重新整合在一起并不是一件易事。

对于体系的反对者，这一事实也不一定是个好消息。分裂的结果难以预料。最终取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也许是更好的，但也可能更坏。因此，我们有理由既不绝望也不欢庆。然而有一个基本上令人鼓舞的因素。结果将是我们集体努力的成果，正如在新的反体系运动的著作中所表明的那样。虽然以前大的波动造成小的变化（因此出现了“决定论”，因此出现了对改良主义成果的幻灭，甚至被称作“革命”时也是如此），但现在小的波动将引发大的变化（因此为真正的“代理”开放，因此我们都要承担责任）。

世界体系现在正在发生变化。这不再是那种小的、不断积累

① 最初对这点的论述是在1974年，在“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Concept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作为第一章重印于*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1-36。

② 对这种情况的详细讨论见我的“Crisis as Transition” in S. Amin et al., *Dynamics of Global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2, 11-54。

的周期和趋势的时期。1989 年可能是一道对过去封闭起来的大门。我们现在也许进入一个真正不确定的领域。当然，世界体系将继续运行，甚至运行得“不错”。但恰恰因为它将继续像它 500 年以来一直运行的那样运行，追求无休止的资本积累，所以它很快将再不能够以这样的方式运行。历史的资本主义像所有历史的体系一样，将由于它的成功而不是它的失败而消失。列宁去了。威尔逊去了。